

王乙康： 一党制是小国 取得平衡关键

何惜薇 报道
hosb@sph.com.sg

教育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王乙康相信，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小的国家，人民透过自由选举投选的结果，将促成一党制的政治体系。

他昨天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常年旗舰论坛“新加坡透视论坛”上，针对“如果新加坡变成两党或多党制，那该怎么办”的主题发言时说：“我相信一党制可能是我们这个小国取得平衡的关键。这个政党可以是今日的人民行动党，但将来也可能是其他政党，只要这个政党是特定时间点上最有本事的一个。”

他分析，住在樟宜和裕廊的新加坡人，尽管对国家课题的关注和看法不尽相同，但不会像住在阿拉斯加和纽约市，或雅加达和西巴布亚省（West Papua）的人民般南辕北辙。“对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言，地理距离造成人民的生活方式、视野、价值观和政治取向都不一样，这也催生多党政治。”

王乙康2011年首次参加大选，但无法代表行动党守住阿裕尼集选区，一夜间成了该集选区的在野党员。随后，有地方组织邀请他当活动主宾，也有其他组织力邀当选的工人党议员出席。

一旦出现多党制 各个体系将出现分裂

他笑说：“大部分组织邀请两党代表出席，我感觉宾客喜欢看到我们‘碰撞’。”

他说，一旦出现多党制，各党各出奇招争取各界的支持，上述局面就会在全国出现。届时，工会不再维持与行动党的“共生关系”，各个协会、宗乡会馆、

艺术和体育团体，甚至是休闲俱乐部等都可能分裂。

王乙康认为，最受多党体制考验的是民事服务，因为这个应保持中立和服务任何一个政府的公务员体系，或就会因每五年“改朝换代”而必须不断重新调整政策，大大影响公务员士气。

“50年后，如果出现多党制，各党的政见将出现什么不同？什么可造成党派之争？是关于应给予公共服务、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多少资助吗？……如果是针对可分裂新加坡的种族、语言或宗教等邪恶力量，那该怎么办？众所周知，政治、种族和宗教是致命的组合。”

另一名主讲人，悦榕控股执行主席何光平说，许多人认为让政党轮替是可持续的做法，但他本身却觉得，最理想的做法是把行动党的内部竞争制度化，保持该党活力。

对此，王乙康说，行动党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确保党内多元化，包容不同意见。“现在可说是有多多个行动党，有李显龙总理的行动党、副总理尚达曼的行动党、（义顺集选区议员、关爱动物人士）黄国光的行动党、（惹兰勿刹集选区议员、照顾特需人士权益）潘丽萍的、（西海岸集选区、工运议员）郑德源的，或者（国会议长）哈莉玛的。每个人有不同倾向，希望达到不同目标，行动党必须足够宽大来包容他们所有人。”

论坛也出现一个小插曲，我国巡回大使许通美发问前大力夸奖何光平和王乙康，说前者睿智，年纪更大时将是民选总统人选，也说后者是“值得信任和领先”的下任总理人选，引起哄堂。

相关新闻刊第4页

学者：中美关系交织 新加坡未必要选边站

学者指出，除非出现一些异常情况，否则不会出现选边站的可能。这些情况包括中美关系严重破裂、美国出现意气用事的总统等。

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度提升，以及中美关系相互交织的缘故，新加坡不太可能面对需要在大国之间选边站的困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院长廖振扬教授昨天上午在政策研究所举办的“新加坡透视论坛”首场讨论会上，就“新加坡如果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命题发言时提出以上看法。

廖振扬指出，除非出现一些异常情况，否则不会出现选边站的可能。这些情况包括中美关系严重破裂、美国出现意气用事的总统、中国民族主义势力掌权、中美相互圈划势力影响范围、新加坡外交政策失败等。

负责主持该场讨论会的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在介绍该命题时指出，选边站“不一定只是假设性问题”。

他说：“大国如果变得喜欢寻衅……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的空间就会缩小。”

廖振扬指出，美国对本区域事务热忱减退，加上中国对外交涉态度愈发坚决的背景下，马来西亚和中国共同建设的马六甲皇京港，以及菲律宾疏远盟友美

国，同中国修好，容易被外界定格为“选边站”。

但他强调，“选边站”喻指的是零和博弈，而中美关系交错之深，远比“选边站”来得复杂。

这些因素包括，美国在本区域仍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中方不愿见到美方弃本区域事务于不顾；美国在惠及本区域同时也能从本区域获利，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完全单方面脱离本区域；中国已跻身经济强国，漠视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将显得“可笑”；中美关系过去几年在双边、区域和全球事务上的关系不断扩大和加深。

若要选边站 考量五个原则

不过如果到了非得选边站的地步，新加坡应根据五个原则做出选择，即：国家利益、不让他国干涉新加坡内政、不要被周边国家误解为墙头草、充分考虑中美以外本区域其他大国的关系，及维护亚细安团结。

谈到亚细安是否能有效维持中立时，廖振扬说，亚细安国家曾在1971年发表《亚细安中立化

学者：国人有特殊性 才能选出独特政府

新加坡人以最高标准要求政府合乎情理，但在社会变得更多元化的环境里，国人首先必须确保自己具备特殊性，才能选出独树一帜的政府。

政策研究所所长贾纳达斯·蒂凡（Janadas Devan）昨天在“新加坡透视论坛”致开场白时指出这一点。

他强调，新加坡政府如果无法做长远规划，就会失去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创造非凡的特殊性（exceptional）。

国人用选票表达不满 并非“被宠坏”

贾纳达斯也是政府首席公共沟通司长。他说，本地基础设施2011年之前因缺乏长远规划而超出负荷，事态严重程度虽不比其他国家治理上的疏失，但人民行动党因此在当年

大选流失选票。

然而，贾纳达斯不认为国人用手中一票表达不满，意味着国人“被宠坏”。他说：“相反的，新加坡人指望政府时时具特殊性是正确的……新加坡不能有一个采取不干涉（laissez-faire）态度的政府，更毋谈一个二等政府……新加坡人应时时以最高标准要求政府。”

不过，要做到这点，人民就同样必须具备特殊性，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尤其在国人受教育程度提升、对公共政策看法多元化的当儿，更应选贤治国。

贾纳达斯说：“如果我们的政治受毒侵，由本土主义者、新法西斯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当权，我们不会有重头来过的第二次机会，我们会完蛋。这和一党独大或两党制无关。”

宣言》，提出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与中立区的概念，中立性至今仍是亚细安的一个愿景。

另一名演讲者、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席王赓武教授则指出，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作

为战后的新兴概念，是“仍在施工”、还未实现的愿景。王赓武解释，小国希望通过联合国和国际法在大国面前维护自己的主权，但他说：“我们（小国）仍抱持希望，但这事没有保证。”



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右二）昨天主持“新加坡透视论坛”首场讨论会，三名主讲者分别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廖振扬教授（左起）、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席王赓武教授，以及蚬壳国际全球商业环境首席政策分析师孔朝恩博士。（海峡时报）